

论译文读者地位的多视角凸显

郭庭军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翻译学研究的推进得益于众多毗邻学科的蓬勃发展。这些学科对作为接受客体的读者的关注对翻译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以哲学解释学、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学、美学等学科对翻译学研究影响最大。文章通过对上述学科理论成果的借鉴,指出译文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矛盾统一。同时,通过深层翻译理论的构建,使译文读者的诸多影响因素科学化、合理化,以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与提高。

[关键词] 译文读者; 地位; 翻译理论; 矛盾统一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3-0094-03

一 现代译学的综合性

翻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尤其是现代译学,通常是在毗邻学科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下获得向前推进的势头(momentum)^{[1]480}。现代译学的发展进步极大地得益于哲学解释学、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学、美学等学科的丰硕成果。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借鉴毗邻学科的理论成果,借“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玉”(即翻译学语言学深层理论的拓展和构建),以适应时代发展和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构建比较完整的翻译基本理论和深层理论体系,使翻译理论研究既恪守源远流长的人文性,又建立在严谨的科学方法论的整体基础之上^{[1]482}。

这些对翻译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包括哲学解释学、起源于文学批评学的解构主义理论、接受美学以及语言学的深层结构理论等,它们对接受客体的重要地位的论述为译文读者地位的科学化、合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将译文读者作为重要一元引入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域。

二 哲学解释学与读者地位

(一)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关注读者能动性

在近代翻译理论的研究潮流中,许多学者关注并引用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理论。此派哲学家认为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当作者创造出了一件作品(文本)以后,这件作品就是一个脱离了作者的自足存在。伽达默尔认为,每个读者都是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即“先见 prejudgments”或“前理解”preun-

dstanding /presupposition)进入认识的境界。人们面对本文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本文与主体相互通融的产物,理解就是本文所拥有的诸多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即视界融合(Horizontversmelzung /fusion of horizons)。但伽达默尔并没有把“先见”完全正当化。伽达默尔在反对把“先见”看成是一种错误的没有根据的判断的同时,也承认存在着与构成理解的“真前见”相对立的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存在着误解和不正确的理解。哲学解释学充分认识到了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这是它对解释学所作出的贡献。哲学解释学还正确地认识到了“先见”的限度,即我们的“先见”并不总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它承认存在着导致误解的先见,反对囿于一种不合理的“先见”之中,要求先见的开放性和敞开性,相信通过“先见”与文本的不断“交换”和“交流”,修正不合适的先见,并获得对文本的理解。而每次理解都不是理解的永远完成,对文本“真正意义的汲舀(Ausschöpfung)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2]。

读者的能动性首先体现在其对译文的阅读活动上。读者的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途径。因为阅读是一种知觉和创造的综合,其中充满了读者的预测和期待。正是在这预测和期待的过程中,作品才得以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在阅读过程中,由于读者的阅读实现作品的意义,也使译者的艰辛得到了读者的承认;同时,由于译文读者阅读视野的不断提高,又导致了译文的多样性,也促使译者对译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美国当代方法论解释学理论关注读者影响的规律性

美国当代方法论解释学理论家赫施(E. D. Heirsch)指出:“一件文本只能复现某个陈述者或作者的言语,或者换句话

[收稿日期] 2008-12-26

[作者简介] 郭庭军(1972-),男,河北唐山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说,没有任何一个含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3]赫施提出了“含义”(meaning/ Sinn)和“意义”(significance/ Bedeutung)两个概念,他进而分析了含义和意义的不同:“一件文本具有着特定的含义,这特定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中,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4]赫施看到了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含义的可复制性。而“意义”这一概念等同于我们常说的理解,在时间行程中,读者的态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是变化的,不同理解不会改变文本的“含义”,即这些因素不会对译文的复制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对于翻译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5]。

方法论解释学因整体上没有正确认识到“先见”在理解中的作用而要求清除“先见”虽然显得过于幼稚,但是,如果把他对“先见”的批评缩小到“不合理”的先见上,缩小到发生误解的先见上,那么,它要求清除“先见”的立场,仍然可以成立。而清除的主要办法——即“虚心”,与伽达默尔所要求的开放性也并不矛盾。

其实,理解决不只是运用“先见”的过程,实际上它同时也是突破已有的先见并产生新的“先见”的过程;不只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视域冲突”的过程。此外,“时间距离”在理解中的作用,也不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令人乐观。方法论解释学所说的“设身处地”和“同情理解”,并非完全失效。

综上所述,由于读者“先见”的客观存在,每个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都会有不同理解。延伸至翻译作品,译文读者所具有的主观的信仰、经验和期望同样会引起不同联想,产生不同理解,但这正是译文作品的魅力所在。译文读者的“先见”及因此产生的可能理解恰恰是在翻译中不该产生影响的因素。“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适用于原语文学作品的解读,却并不是翻译作品的目标。翻译中想当然地为读者作出诠释,未必得到读者认同。各国早期的翻译中,大量被此影响的译作都被看作了败笔,可为前车之鉴。

三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与译文读者

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的代表人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因为意义是一个可能在无限的链(可以具有无限的联系的、多义的和互文的)上的关系和差异所产生的效果,因此,意义永远是有差异的和被延迟的,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6]。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该理论宣称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它提供游戏的空间,延伸边界,为差异提供新的道路(differences)。这意味着不同读者由于不同个人因素而产生的不同理解都是原文扩展的新意义,译文读者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条件无可避免地影响译文的生存。

诚然,作品的意义是多元化的,但这并不能成为翻译中对原文的歪曲与篡改的借口,如翻译可受任何个体因素影响,翻译文本全无确定性,一切翻译标准岂不是毫无意义。

实际上,译者的工作就是以读者身份进入作品,最终摆脱个体读者的影响,忠实“复制”原作表述,复制多元意义和开放性的语言,“用目的语中的相同或相近能指链替代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7]。译文读者对于译文意义多元化的寻求,对翻译的忠实原则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忠实不再局限于表层意义和深层含义,还包括了开放性语言符号。

解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提出了“抵抗式”翻译策略,反对一味追求通顺的归化式的翻译^[7]。其理论中反映了对译文读者文化地位的关注,指出译文读者对翻译中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的篡改的存在与危害。

四 接受美学理论与读者地位

姚斯(Robert Jauss)、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接受美学理论(Reception Aesthetics)提出,作者—作品—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决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素。相反,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8]。从翻译上说,译文的确是特定的目标读者而作的,但目标读者在对译文的接受与理解上的作用不应被夸大决定性的,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应该影响翻译;翻译目的论过于强调译文读者对翻译的影响力,过于广泛地界定目标读者,使翻译成为了不确定和任意的行为。

此外,接受美学中提出“空白”概念,对翻译研究颇有借鉴意义。原作中的“空白(gap)”仍须在译文中保留,译文读者根据个人知识和阅历填补“空白”的结果不影响译者对译文的忠实再现。许钧先生也提出:译者要避免主观看法和个人解释,充分忠实于原文,让读者保留理解和想象的空间^[9]。该作者赞成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未定点(即“空白”),译文读者填补空白的过程不应包括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读者基于个人经历对未定点的诠释不能影响译文。

五 等值理论与译文读者地位

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深受现代科学语言学的影响。他在《迈向翻译的科学化》一书中号召“译学向科学化发展”^[10]。奈达的“等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者反应论”(Readers' Response Theory)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很快便在我国翻译界引起强烈反响并赢得了高度的重视。应该说,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也注意到了读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但应是奈达首先将它作为重要的一维引入了翻译理论与实践。

奈达的翻译理论显然是侧重于语言的科学分析的,但又远远超出了前人单纯的语言分析视角,而明显有机地包含了文艺美学观的因素——他强调读者的审美反应,80年代以后,奈达又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交际活动,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符号的相互作用活动,其实,强调所谓社会符号的相互作用,显然是为了消除交际功能以来反应读者的主观性^[11]。

对于一部作品,来自于两种不同文化或社会的读者能否产生等值的反映呢?王东风先生认为,“虽然这些表达方式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可能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义价值或某

种交际功能,但由于各自特定的文化或社会身份(identity),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为各自文化所独有的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因此往往无法使以不同的文化或社会身份进入阅读过程的读者产生相同的反应”^[12]。王先生将不同文化的差异扩大到了不可译的程度,否认了人类知识的共性与同构。实际上,人类知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有共性的,差异当然存在,但是可以明晰和沟通的。的确,译文读者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将会影响阅读过程,产生不同的文化联想意义,但只要对等目标读者(后文将有定义)意识到所阅读的是异国文化译作,必然能够以其必要的认知和辨析能力遏制本族文化引起的干扰性文化联想,以期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反应。文化的差异将影响译文的文化信息的处理手法,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是可能的。

奈达的理论中对于对等目标读者的阐释不够明确。本人认为等值反应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读者对等”,即要有理想的目标读者。当然,这种对等是一种动态的对等。因为某些原文的目标读者在现今已不复存在,如果只死板根据原文的目标读者特征来寻求译文的目标读者,可能会导致读者群的缩小或放大,甚至找不到读者。所谓“对等”指两种语言中的读者具有相同的基本能力、知识层次,但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历史文化背景、审美习惯、个人生活经历等。只有在读者对等的前提下的“等值反应”才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前提下讨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影响才有意义,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深入探讨译文读者的各种因素对翻译可能造成的影响。

六 译文读者对翻译的影响

读者群中受教育程度和对外国语言文化了解程度参差不齐,每个人价值取向(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行为规范等)、心理取向(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种族性别等)、情感取向、审美取向、个人生活经历等都各不相同。这是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问题关键在于读者群的众多差异是否都该被译者所考虑和照顾,进而影响译文?答案应是显而易见的,译文读者的大多数个人因素不应影响翻译过程。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正是语言的同构性及深层语法的存在决定了译文读者对翻译的影响具有客观规律性,可以遵循科学的方法来规范;而语言的异质性又决定了译文读者

的作用具有主观能动性,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应是两者的矛盾统一。同时,原作的意义是相对确定和稳定的,这决定了文本的可译性和可复制性。只有复制出了相同的原语信息,在对等的读者中才能产生等值反应。尽管读者个体对于译语信息的理解因个人因素而存在差异,但并不能动摇作者原意的确定性。从根本上讲,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影响只体现在原语信息的再表现方式和途径上,而不在于内容本身。

[参考文献]

- [1]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2]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23- 29
- [3] 赫 施. 解释的有效性[M]. 王才勇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269
- [4] 赫 施.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 宋建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16- 17.
- [5] 谢天振. 作者本意与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J]. 外国语, 2000(3): 57- 58
- [6] Derrida Jacques Margins of Philosophy[M]. Alan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3- 5
- [7]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8- 9
- [8] 姚 斯, 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 金元浦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16
- [9] 许 钧. 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文本再创造的个案批评[J]. 中国翻译, 2002(3): 25
- [10] Nida Eugen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64 11- 12
- [11] 黄振定. 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84
- [12] 王东风. 文化差异与读者反应——评N的读者同等反应论[M]/ 廖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26- 28

On the Role of Target Language Reader from Multiple Angles of View

GUO Ting-j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to the role of target language(TL) reader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applications of various schools of western theories—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Deconstruction,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modern linguistic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L reader a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in the pluralistic relationship of translation, have both active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cientific analysis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L readers so as to improve the studie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Key words TL readers, role, translation theories, unity of opposites